

红学

孙玉明 著

1954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红学： 1954

孙玉明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红学研究的成果，也是作者对红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本书以1954年为界，对红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红学研究的现状，第三章为红学研究的成就，第四章为红学研究的不足，第五章为红学研究的展望。本书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红学研究的现状，为红学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学：1954 / 孙玉明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11

ISBN 7-5013-2183-3

I. 红... II. 孙... III. 《红楼梦》研究—史料—

1954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92352号

书名 红学：1954

著者 孙玉明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26153 传真 (010) 66174391

E-mail B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21.375

版次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13-2183-3/K.687

定价 35元

对“红学”诸多问题的论争，形成了红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论争，学术就难以向前发展，“红学”也不会显得如此热闹非凡。

早在曹雪芹增删修改《红楼梦》的过程中，对诸多问题的论辩便已开始，此后断断续续，直至今日，似乎永无休止。更令人感到惊叹的是，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争论的问题却越来越多，论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又随之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恐怕还不多见。

脂砚斋等早期评者们的相互辩驳，后世文人因“一言不和”而“几挥老拳”，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战”，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论争，都属学术论战性质。唯独发生在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却与其他论辩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而超越学术层面而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

本来，当“两个小人物”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及《评〈红楼梦研究〉》这两篇文章与俞平伯商榷时，论争的性质仍然停留在学术层面，但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这场学术论战便彻底改变了性质，批判的锋芒也随即指向了统治中国学术界达三十年的“胡适思想”。

领袖人物的介入，举国文人的参战，批判对象的更换，论辩也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由于这场运动的特殊性质，也自然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运动爆发以后，海内外媒体便纷纷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回顾反思这段历史的论著更是屡屡可见，但平心而论，由于这些论著缺乏必要的史料，论述者的出发点与思想倾向又各不相同，因而其中往往

> > > > 前 言 < < < <

充满了想当然的猜测之词，所言自然也不会符合所谓历史的真实。

这是一个人人关注的话题，但却很少有人能够讲清它发生和发展的真实过程。今天，在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陆续披露以后，也为我们如实地描述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能。

1989年6月，笔者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部，因工作需要而不得不去了解“红学”的历史。悠悠数载，恍如一梦。尚未窥见“红学”的门径，苦读“红学”史料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却都成了历史。因深感查找资料之苦，便产生了写《红学论争史》的念头，为自己也为他人提供阅读和查找上的方便。然而，有什么想法是一码事，具体运作起来却又是另一码事。“红学”何其深奥！仅凭才疏学浅的我，又怎能完成这项重任？于是，1996年年初，我很干脆地敲起了退堂鼓。

然而，手中的史料，心里的想法，师友的鼓励，却又使得我欲罢不能。数月后，我突发奇想，决定避难就易，写一写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这个许多人都关心的话题。结果还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及知情者，悠悠忽忽，又过去了将近两年。资料虽然搜集得差不多了，却又由于种种原因，依然不能开笔。后来，在关心我的师友们的催促下，我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挥戈上阵”，担当起这项力不从心的苦差事。说实在的，以我的能力，是负载不起对这段历史的沉重反思的。如今，书是写出来了，但究竟是成是败，我自己心里却一点都没底儿！

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主观上一直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反映这段历史。然而，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毫无作用，初稿写成以后回头修改，却发现其中的感情色彩仍然很浓很浓。

这是无奈之中最无奈的事，写书而不带感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有几个问题需要略作说明：

一、这场批判运动，很难起一个准确的名字。定名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个名字，其实只能涵盖运动的部分内

容。定为“1954年大批判”，也不确切，因为它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实际上，这是连环扣式的一场大运动，是由几个彼此联系却又各自独立的小运动共同组成的：由“《红楼梦》研究批判”引发了“《文艺报》事件”、“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案件”、“丁玲、陈企霞案件”，又由“胡风案件”引发了“肃反运动”，可谓“戏中有戏，山里套山”。要用一个名字准确简练地涵盖这么丰富的内容，委实很难。但因这场运动起因于《红楼梦》研究批判，而其爆发时间又是在1954年秋，且重头戏都已基本上演，第二年发生的“丁、陈案件”也已埋下了伏笔，因此将本书定名为：“红学：1954”。

二、在同一个时空中，几个事件同时交错出现，犹如同一个大舞台上同时上演着几部既有联系却又各自独立的戏，可谓千头万绪，很难理清。即使勉强按时间顺序叙述，也难免让人感到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而且还很容易造成挂一漏万的弊端。然而，事是人做的，戏是人演的。即使有多少部戏同时上演，亦可首先分头抓住每部戏的“主要演员”，然后以主带众，兼及“群众演员”。因此，本书采用了史书常用的纪传体例，即以重要人物为主分出章节，每一章都以人物的活动线索为经纬叙述事件。为避免重复之嫌，亦采用史书惯用的互见法，此详彼略，以便读者互相参看。

三、书中述及批判文章时，为了保存一份“历史的真实”，更多地引用了批判文章中的文字，这便导致了与全书风格的不尽统一。然而，史料似比任何东西都更具有说服力！为了“保存原貌”，以见出当时那段“真实的历史”，即使笔者受到“躲懒”之讥，也只能如此。

四、也正是为了保存那份“历史的真实”，所以本书在引述批判文章时，也都无一例外地指名道姓，并详细注明刊载的报刊和具体日期。虽然如此，矛头也不是具体对准哪一个人，只是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以涵盖当时的那段历史，并非特指“某一个”。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往往都是对特定时代特定事件中某种现象的高度概括。搞文史研究的人，也都明白这个道理，用不着多加解释。

> > > > 前 言 < < < <

五、与之相联系，本书在引述批判文章时，当然是按自己的主观看法来选择的，但选择的标准却是基于文章的具体内容。在这些作者中，有许多是我非常崇敬熟悉的老先生，甚至还有一些是我老师的老师。然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按照自己的是非原则，我不仅选取了他们的文章，而且在引述时还经常予以评判，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批判。但即使如此，我从内心深处仍然是尊敬他们的。所谓批判，也只是就事论事，并无其他任何目的。“对事不对人”，乃是本书的一贯宗旨。

六、基于这一宗旨，即使对同一个人，本书也有截然不同的评判，这主要是看他在具体事件中的具体表现如何，并非笔者没有主见的随意评判。

七、本书统一体例，无论提到任何人，都一概不加“先生”、“老师”乃至职务等敬称。还望当事人及读者鉴谅。

笔者在收集资料和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许多师友这样那样的支持和帮助，若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本书也许很难面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虽然是由笔者执笔写成的，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集体力量的结晶”。这些曾经对本书的撰写做出过贡献的人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郭又陵、殷梦霞；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李希凡、胡文彬、张庆善、王湜华、王路、张云、傅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世德、邓绍基、樊骏、张国星、竺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刘国辉、周绚隆及资料室的部分同志；人民出版社的戴联斌；中华书局的顾青；北京大学博士生段江丽、詹颂；天津社会科学院的门岗、孙玉蓉；山东大学的袁世硕；及俞平伯家属俞润民夫妇等。谨借此书出版之机，向他们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孙玉明

2001年3月4日初稿

2003年2月16日再改

2003年8月22日改定

前言	002
第一章 俞平伯误入“红尘”	002
一、人生路上的“错误抉择”	003
二、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	013
三、引火烧身的《红楼梦简论》	021
第二章 两个小人物意外走“红”	034
一、《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	035
二、《评〈红楼梦研究〉》	043
三、一举成名天下知	052
第三章 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这场运动	066
一、运动爆发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067
二、运动终于爆发	072
三、他一直控制着运动的方向	082
第四章 他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090
一、“贵族老爷”冯雪峰	091
二、批判运动中的胡风	104
第五章 《文艺报》成了替罪羊	120
一、“替罪羊”罪有应得	121
二、万炮齐轰《文艺报》	126
三、自相戕戮自张罗	142
四、“丁、陈事件”的导火索	145
第六章 风暴中心的俞平伯	158
一、“红极一时”反招祸	159
二、一次奇特的座谈会	166

第一章

【俞平伯误入“红尘”】



俞平伯（右）与其曾祖父俞樾



俞平伯（左）与张庆善（中）冯其庸（右）
在北海公园

侧耳幽深的时光隧道，似乎总能听到一声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叹息是无奈的表白；叹息是难言的追悔。

苍天悠悠，红尘滚滚。“无才补天”的曹雪芹在叹息，“误入红尘”的俞平伯也在叹息。前者的叹息化作了不朽名著《红楼梦》，后者则为人生路上的错误抉择而沉思。

这是一段发人深思的历史，却也是一段不易表述的历史。倘若历史确有情，历史也当为俞平伯的抉择而叹息。

俞平伯与《红楼梦》，可谓冤缠孽结大半生，但是祸是福，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本应在诗文创领域扬名立万，由于偶然的机缘，误走上《红楼梦》研究的道路，终至引火烧身，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自己也成了举国上下妇孺皆知的人物。殊不知，这位以治红学而闻名于世的“红学家”，早年却并不喜欢《红楼梦》。他之所以走上这条对其个体生命来说是荆棘丛生的道路，主要是受了胡适等人的“诱惑”。此事说来话长，欲知详情，还须从头说起。

> 人 生 路 上 的 “ 错 误 抉 择 ” <

人生路上的“错误抉择”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半年多,神州大地便很快恢复了昔日的沉寂。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所有的一切,似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永远消失。

喧嚣热闹的大上海,即可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这座永远保持着自己独特风貌的大都市,似乎任何外力都不能对它产生丝毫作用。凛冽的寒风,连天的战火,都抹不去上海滩的热闹繁华。十里长街,仍旧灯红酒绿;黄浦江上,依然舟来船往。

1919年年底,年仅二十一岁的俞平伯赴英留学前在上海候船,仅呆了短短的一个礼拜,看到上海的现状,联想到社会各界的冷漠,便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哀:“从‘五四’以来,新运动渐渐盛了;各地方响应我们的同志渐渐多了;好像新中国的建设总就是十年八年的事。但我在北京的时候,同朋友们谈话,讲到这事,总不抱乐观,总有怀疑,觉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相当的代价。几个月的奋斗实在算不得一回重大牺牲。真正新运动的成功,又非有巨大牺牲不可……自我南行之后,和南方社会相接触。从上海一般人做观察点,更觉障碍多希望少。前途的战争是绝大的,不可免的。我们不抱有始终一致奋斗不辍的大决心,决不会有真正的成功。前途既然这样淡黯,战场上的兵卒既不多又不尽可靠,理想的她何时实现!”^①

一番痛彻肺腑之言,既对理想的社会寄予殷切的期待,又对麻木不仁的国民感到绝望。在“举世皆醉”的环境中,“独醒”者无疑是最痛苦的。

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可悲可叹又可悯!“五四运动”所殷切呼唤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实在缺乏适合它们生长的土壤!“科学”与“民主”,将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灾难深重的中国无缘。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化作了梦幻泡影!熊熊烈火熄灭后,死灰安能复燃?滚滚江河东流去,水流岂可回归?

然而,烈火燃烧时曾经产生过热量;江河奔流时曾经发出过咆哮。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发挥着作用。衡量一件事情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应该看它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什么作用!

花无百日红,但花朵的凋谢却孕育了新的生命。

俞平伯毕竟还很年轻,虽然忧国忧民之心可嘉,但他也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

当时的中国,看似一潭激不起半点涟漪的死水,但水底下却是浪潮翻滚,暗流涌动。各种各样的新思潮从四面八方纷纷涌来,为这潭死水注入了活力。当然,水流交

汇,自然也是泥沙俱下,这其中到底孰清孰浊,却不似泾渭那么分明。

与此同时,觉醒了年青一代,也成了不甘困处死水中的蛟龙。他们迎着滚滚而至的江水,逆流而上,纷纷奔向江流的源头。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留学热潮。

刚刚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俞平伯,也自然而然地被卷入了这个浪潮中。这次与他结伴同行的,便是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俞平伯的同窗好友傅斯年。

1919年夏天,他们刚从北京大学毕业。临毕业前的一个多月,便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傅斯年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俞平伯则是积极参与者。这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难得一遇的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而“民主”与“科学”的召唤,则更加坚定了他们到发达国家去深造的决心。

1920年1月4日上午9时,伴随着汽笛的长鸣声,一艘巨型客轮沿黄浦江缓缓向前驶去。乘坐这艘大船的旅客中,连俞平伯和傅斯年在内,一共只有八个中国人。^②虽然同坐一艘船,但他们与其他乘客的心情却截然不同。一方是即将回归故里的兴奋与喜悦,另一方却是远离祖国的酸楚和惆怅。当然,对于出国留学的俞平伯和傅斯年来说,自也充满了对前途的憧憬和希望。

船行后,这八个中国人尽皆站立在甲板上,默默地眺望着渐渐远去的十里洋场。对于他们来说,执手相送,挥泪告别,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就在昨天晚上,因大客轮吃水深,他们便被一批批地用小火轮运送到了大船上。如今,送行的人们早已归去,他们也在客轮上度过了第一个难熬的夜晚。因而,到了真该挥手道别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道别的对象。

上午11时,客轮开出吴淞口,下午入海。“海水由绿而蓝,翻跃作银波,下泛湖色,甚丽。”^③美丽的景色,暂时冲淡了游子们即将远离故土的忧伤之情。

客轮一直南行,气候也日渐和暖。冬日的严寒,已被远远地抛在了脑后。然而,海天茫茫,光明的前程又在哪里?

大海虽然美丽,但长达月余的远程旅行,却难免让人产生与沙漠一样的单调感觉。海天一色,茫无际涯,寂寞、无聊之感也会随之而来。当此时,若想消除这种难耐的情绪,最好的办法便是读书或聊天。也正因为聊,也正因为读,所以在这次远行途中,俞平伯与《红楼梦》之间,方才大大地拉近了一段距离。

船舱里,随着马达的轰鸣,俞平伯独卧床上阅读《红楼梦》;甲板上,迎着凛冽的寒风,俞平伯与傅斯年面对面地畅谈《红楼梦》。汹涌而至的海潮,依稀变成了大荒山;飘浮空中的云团,仿佛化作了太虚境。傅斯年侃侃而谈,时有真知灼见,不知不觉中,将

> 人 生 路 上 的 “ 错 误 抉 择 ” <

俞平伯带入了令人神往的大观园。

俞平伯深深地受到了感染,最终抛弃了他以前对《红楼梦》的偏见。在这次远行途中与傅斯年的数次长谈,既对俞平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使他对此终生难忘。就在自英国归来后,俞平伯痴迷地投入到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时,他还在《红楼梦辨·引论》^①中,十分动情地提到了傅斯年对他的影响和感染:

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红楼梦》底兴趣,十二三岁时候,第一次当他闲书读,且并不觉得十分好。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告诉我姐姐说:“《红楼梦》是不可不读的!”这种“像煞有介事”的空气,使我不禁失笑,觉得说话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傻?

直到后来,我在北京,毕业于北大,方才有些微的赏鉴力。1920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此书竟做了我们俩海天中的伴侣。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此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

十二、三岁的少年,喜读传奇色彩甚浓的小说,乃是情理中事。但早年并不喜欢《红楼梦》的俞平伯,在与傅斯年交谈之后,方始“熟读《红楼梦》”,且后来他对《红楼梦》的研究,虽然也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他却往往都从文本出发,“用文学的眼光来批评”《红楼梦》,则明显是受了傅斯年的影响。

当然,若将俞平伯走上《红楼梦》研究之路的原因完全归之于他人的影响,则未免与实际情况不符。就在这次旅欧过程中,当俞平伯做出归国的决定后,傅斯年曾经几度苦苦劝说挽留,甚至为此追赶到法国的马赛,但俞平伯还是没有留下。由此亦可说明,一个人若是受到另一个人的影响,首先必须自己具备一种禀赋。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一定的温度下,鸡蛋能够孵出小鸡,而石头则什么东西也孵不出来。

俞平伯,名铭衡,字平伯。1900年1月8日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俞陛云,字阶青,号乐静居士。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贡士,殿试以一甲第三名赐进士及第,是一个能诗善赋的学者型诗人。母亲许之仙,乃清王朝苏州知府许祐身之女,亦精通诗文。其曾祖父俞樾,字荫甫,号曲园,则更是清代赫赫有名的朴学大师。俞樾于清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不久又简放河南学政。罢官后迁居苏州,奋力治

学。清同治四年，江苏巡抚李鸿章推举他为苏州紫阳书院教席，不久，又被浙江巡抚马新贻聘为杭州诂经精舍山长，且担任此职长达三十一年之久。俞樾一生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俞平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著名学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黄侃等人都对他青眼有加，这不仅是因为俞平伯的聪明好学，更重要的还是看重了他的出身门第。当然，他们的这种看重，并非世俗的人情冷暖，而是文人对文化的一种由衷的崇敬。俞平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下，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此，在其人生旅途中，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他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教书治学的道路。

2月21日，客轮抵达英国利物浦港。这是俞平伯有生以来历时最长、行程最远的一次海外远行。

22日8时45分，俞平伯、傅斯年又由利物浦乘车，下午2时30分到达伦敦。此后，见到了陈源等老熟人，也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异国他乡，有同胞相伴，本该消除游子的思乡之情。然而，伦敦的愁云惨雾，却令俞平伯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

1919年10月，俞平伯在为前往美国留学的同窗好友杨振声送行时，曾经声情并茂地写下了《送金甫到纽约》^⑤一诗。在诗中，他羡慕杨振声走上了光明的“途程”，慨叹自己“还蜷伏在灰色的城圈里，尝那黄沙风底泥土滋味，睁眼看白铁黄金扬眉吐气”，并希望自己能够与杨振声“携手在无尽的路途上，向无限的光明去”。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候船。在办理完各种手续后，已是次年的元月初，终于1月3日晚正式开始了“向无限的光明去”的行动。然而，当他与傅斯年携手走出那“灰色的城圈”，远涉重洋来到伦敦后，却发现这途程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光明”。他的梦想幻灭了。

在伦敦小住十多天后，倔强的俞平伯突然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回国！

一旦拿定主意，便立即付诸行动。3月5日，俞平伯到日本邮船公司买了船票，然后又到中国领事馆取了护照。第二天上午11时，他登上了日本邮船佐渡丸。

以后的历史将会证明，对于俞平伯的人生道路来说，这是一次错误的抉择。只可惜俞平伯不是神仙，不具备未卜先知的本领。

对于这次匆忙的来去，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⑥一书中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

外祖父自费赴英留学，这对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来说，不是件易事。奇怪的是，当年夏天，他便从英国返回。来去何以如此匆匆？不免引起了人们的猜测。

> 人 生 路 上 的 “ 错 误 抉 择 ” <

穿不惯洋服、皮鞋,此为一说;想念、抛舍不开妻子,又是一说。至今确信为后一种说法者居多数。这大概与人们亲眼看到他们恩爱偕老的事实分不开的。哪一种说法更正确呢?我曾问过外祖母,她淡淡地一笑:“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哪里会是为我呢?”

说没有足够的钱,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就在俞平伯去买返程船票那天,亦即3月5日,他还到银行取钱并寄回国内。再从另一个角度想,俞陛云是一个十分细心的人,若无足够的经费,他是不会让俞平伯贸然地跑到国外去的。

实际上,俞老夫人不承认俞平伯是为她而从国外匆匆归来,只是一种自谦的说法。她与俞平伯于1917年10月31日成婚,婚后夫妻感情甚笃。1918年11月7日,长女俞成出生。次年11月14日,次女俞欣又来到了人世。俞平伯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之时,俞成刚满周岁,俞欣则刚出满月。因此,远在伦敦的俞平伯,牵挂家中的娇妻幼女及年迈的父母,从而萌发了归国之心,当是情理中事。当然,仅仅如此,还不足以揭示俞平伯匆忙来去的原因。在他做出出国留学的重大决定时,这些因素该当首先考虑到了,因此,俞平伯这次匆匆来去的超常举动,应当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就是:俞平伯特定的生活经历,使他养成了与外界环境格格不入的个性。也就是说,在异国他乡,他缺乏一种生活自理的能力。

俞家虽为名门望族,但人丁却不十分兴旺。俞陛云一连生了三个女儿,直到1900年方才有了一个男孩儿。这男孩便是俞平伯。这对俞家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而生长在这种家庭环境中的俞平伯,自幼娇生惯养自也在情理之中。1917年,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俞陛云也同时移眷入京,定居在与北京大学毗邻的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俞陛云的这一举动,无疑是为了便于照顾俞平伯的生活。十六岁的人了,当已具备生活自理的能力,但俞陛云却仍不放心,可见俞平伯在俞家的特殊地位。

由此也可推知,俞平伯这次出国留学,阻力肯定是很大的。这种阻力,并非来自妻子,而是来自父亲。俞陛云最后之所以答应了俞平伯的请求,恐怕与傅斯年的同行不无关系。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生。这位比俞平伯大四岁的学生领袖,在北大读书期间,就表现出非凡的组织与领导能力。1918年,北大进步学生成立“新潮社”,他是最主要的发起人和领导人;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又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俞平伯与傅斯年交谊甚深,俞陛云对他深有了解并且十分信任也自不待言。因此,有他和俞平伯结伴同行,俞陛云也就可以放心了。

深厚的友谊,再加肩负的重大使命,使傅斯年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对俞平伯的超常举动进行劝阻。3月14日早晨,俞平伯乘坐的日本邮船佐渡丸抵达法国马赛。傅斯年也从英国伦敦匆匆赶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俞平伯回到伦敦,二人甚至均为此声泪俱下。然而,俞平伯去意已决,傅斯年也失去了对他的影响力,结果二人只好怏怏而别。

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定,倘若俞平伯当时跟随傅斯年回到伦敦,学成归国之后,会不会成为象傅斯年那样的文化风云人物?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就个人禀赋而言,傅斯年就是傅斯年,而俞平伯则只能是俞平伯。即使生活经历相同,个性不同的人也不会走上相同的人生道路。早在学生时代,傅斯年就已表现出非凡的领导和组织才能,而俞平伯则只能是他的追随者。另外,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俞平伯也不是一个适合在政坛上干事的人物。他的父亲俞陛云,虽然中了进士,但也没有做多么大的官儿。其曾祖父俞樾,虽为一代朴学宗师,但也只能去做编修、学政、教席、山长一类的差使。1949年以后,俞平伯虽然积极地参与了各种政治活动,但也只能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一类,并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他的正式工作,还是教学和研究。

不过,当时俞平伯若能留在伦敦,也许就不会走到《红楼梦》研究这条道路上来。可惜,人生没有“也许”。

似乎冥冥中已经注定,他必须赶回自己的祖国,去完成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

对于傅斯年的这份深情厚谊,俞平伯永远铭记在心。归国后,他屡屡梦见傅斯年,并以《屡梦孟真作此寄之》为总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五首诗。诗中描述在马赛与傅斯年分手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年三月十四那一天,濛濛海气蒸着,也是一个早晨,从伦敦来的佐渡丸,正靠马赛底一个码头。有两个人站在船头甲板上,絮絮地说着,带哭声地说着。‘平伯!你这样——不但对不起你底朋友,还对不起你自己!’我虽不完全点着头,但这话好像铁砧底声浪,打在耳里丁丁的作响,我永不忘记。”对于自己的归来,虽说“不去悔着”,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是有一缕“悔”的情绪。

人生无悔,悔又何益?

多年以后,亦即俞平伯65岁那年,他在整理自己这次欧行日记的时候,曾经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此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日记。外出则书,家居则辍,故虽历一载只存片段也。时余方弱冠,初作欧游,往返途程六万许里,阅时则三月有半,而小住英伦只十二、三日,在当时留学界中传为笑谈。岂所谓“十九年矣尚有童心”者欤?抑亦所